



中国书籍文库
China Books Library

汇集优秀原创学术论著
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交流

东亚坐标中的跨国 人物研究

DongYa ZuoBiaoZhong De KuaGuo RenWu YanJiu

王 勇 主编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东亚坐标中的跨国 人物研究

DongYa ZuoBiaoZhong De KuaGuo RenWu YanJiu

王 勇 主编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东亚坐标中的跨国人物研究/王勇主编. —北京:
中国书籍出版社, 2012. 9

ISBN 978 - 7 - 5068 - 3155 - 0

I. ①东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历史人物—人物
研究—东亚—古代 IV. ①K833. 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11429 号

责任编辑/ 李立云

责任印制/ 孙马飞 张智勇

封面设计/ 中联学林

出版发行/ 中国书籍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(邮编:100073)

电 话: (010)52257143(总编室) (010)52257153(发行部)

电子邮箱: chinabp@vip.sina.com

经 销/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/ 三河市华东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/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/ 22.5

字 数/ 405 千字

版 次/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 ISBN 978 - 7 - 5068 - 3155 - 0

定 价/ 65.00 元

前 言

何谓“东亚”？设想这套书系面世，或有读者如此发问。所谓“名不正则言不顺”，兹略陈浅见，以明宗旨。

（一）东方语境中的“东”与“亚”

“东亚”概念既非自古有之，亦非亚洲人自创。

先说“东”字，中国古籍如《二十四史》，把朝鲜、日本等列为“东夷”；然从朝鲜、日本看来，中国则位于“西方”，日本自谓遣隋唐使为“西海使”即来源于此。故而，在中国传统的“天下”秩序中，“东”是局部、边缘的概念，通常不包括中原地区。

再说“亚”字，古汉语中含丑、次、矮等贬义，如《说文》云：“亚，丑也。”《封氏闻见记》说：“郑虔亦工山水，名亚于维。”甚至是“恶”的古字，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乙本《老子·德经》：“天之所亚，孰知其故？”后世亦被用作“恶”的通假字。故而，“亚”非吾人自谓之辞甚明。

（二）西方语境中的“东”与“亚”

“东亚”非汉语固有词汇，亦非传统地域概念，其起源与西学东渐有关。

先看“东”，在西方语境中，大抵有两个起源：一个是“Orient”，另一个是“East”。两者外延有部分叠合，但内涵却各有理路。据[美]萨义德《东方学》（王宇根译本）的说法，对欧洲人来说，东方“自古以来代表着罗曼司、异国情调、美丽的风景、难忘的回忆、非凡的经历”；对美国人而言，“所谓‘东方’更可能是与远东（主要是中国和日本）联系在一起”。经核实萨义德原著，前者的“东方”使用“Orient”，后者则用“East”。给人的印象是，欧洲视域的“Orient”，存在偏见、流于虚幻；美国语境中的“East”，接近现实、注重实利。无论 Orient 还是 East，在西方中心主义格局中，是被异化的、边缘的概念，中国自然被囊括其中。

再看“亚”，此系“Asia”的译音节略字。“Asia”的起源非常古老，相传最早由古代腓尼基人（一说源出亚述人）命名。这个公元前10世纪就活跃在地中海

东岸的航海民族,拥有丰富的天文、地理、方位、海域、造船等知识。他们以爱琴海为基点,以东地区称“Asu”,以西地区称“Ereb”。“Asu”原意指“日出之处”,从中派生出“Asia”;“Ereb”原意是“日落之处”,由此衍化出“Europe”。

(三)从“East Asia”到“东亚”

Asia 所指的范围,限于腓尼基人闻见所及地区,最初是非常有限的。但其后随着罗马帝国势力东渐,其范围逐渐扩大。公元前129年,罗马帝国设立Asia行省,辖境为小亚细亚东部(约为土耳其的亚洲部分);进而延伸至两河流域一带,乃至涵盖整个亚洲。

如上所述,(1)“Asia”起源于一个比较中性的地区,它与“Europe”形成东西对应,与“Orient”属于西欧边缘的概念是不同的;(2)创造这个词汇的民族,在146年的第三次“布匿战争”中,被罗马军队摧毁而烟消云散,因而这个概念也就没有一种主体文化的支撑和不断的熏染;(3)这是一个相对单纯的地理或方位概念,没有附着太多的宗教、文化色彩。

晚明以来,随着西力东渐,西方的地理知识传播到东方,“亚细亚”一词出现在许多西学著作中;同时,西方人对于文明景观迥异的亚洲东端,使用“East Asia”来称呼。于是,如同“亚细亚洲”可略为“亚洲”,“东亚细亚”便被略作“东亚”。

(四)作为研究坐标的“东亚”

显而易见,“东亚”是个意译(东)+音译(亚)的新词。正因为“亚”是音译词,就不带有汉语文脉中的贬义。

“东亚学”在欧美是一门比较成熟、已经定型的学科,但它毕竟是从国别研究进化而来的区域研究(Area Studies),无法完全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主观羁绊。目前在亚洲脱颖而出的“东亚学”,基本上没有沉重的历史包袱,当可面向未来自主擘画。

“东亚”的地理外延并非固定不变,在瞬息万变的国际形势中,时而扩展时而敛缩;“东亚”的文明内涵并非凝固单一,在生生不息的区域交流中,既有吸纳也有辐射。时间上的继承、积淀与空间上的传播、影响,构成一个动态的坐标——这就是我们把握“东亚文化”的依据。

以“东亚”为坐标研究“东亚文化”,窃以为其要点有二:一是以中国为基点,追踪中国文化之传播和影响,彰显华夏文明的世界意义;二是以域外为起点,考察对中国文化之摄取与模仿及创新与回馈的机制,拓展“汉文化”的文明内涵。时间轴与空间轴立体交汇,由此构成动态的“东亚学”。

(五)一段耐人寻味的插曲

2010年9月23日,香港大学举办“East Asian Studies: Retrospect and Prospect”学术研讨会,以庆祝北京大学严绍璁教授70华诞。香港大学美裔教授Louis Edwards在发言中指出:时下亚洲研究正成为热门,严绍璁教授的丰硕学术成就让我们确信,“亚学Asianology”绝不会是低于“西学”的学问,方兴未艾的“亚流”完全能成为主流。

这位博学的Edwards女士,不仅深谙“亚”字之汉语古义,而且了解西方主流学界的偏见,因而说出这段发人深省的话语。

2008年我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工作了两个学期,在东亚系开设了“The book's exchange in East Asia”研究生课程,期间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国际学术研讨会“Commonality and Regionality in the Cultural Heritage of East Asia”,并先后应邀到哈佛大学、罗格斯大学演讲。如果说我的学术成果受到西方主流学者的某些认同,我想那是因为我站立在东亚的土地上研究“东亚”,我是当事人,不是旁观者。

(六)本套“书系”缘起

从2004年开始,我们以“东亚文化交流”为主题,基本上每年举办一次专题学术研讨会,即“道教文化”(2004年)、“书籍之路”(2006年)、“遣隋唐使”(2007年)、“人物往来”(2008年)、“争鸣与共识”(2009年)。各次会议均有论文集问世,但有些论文集只是作为项目报告递交,所以印数既少,流通也不广,加之有些外语论文未及翻译,现在看来留下不少遗憾。

幸运的是,中国书籍出版社出于奖掖学术研究的宗旨,愿意为我们出版“东亚文化交流史书系”,遂以原有的部分论文集为基础,经过重新编辑、翻译、增补,整合成《东亚坐标中的书籍之路研究》、《东亚坐标中的跨国人物研究》、《东亚坐标中的遣隋唐使研究》三册,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基地重大项目“日藏唐代汉籍写本语言文字研究”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“海外日本研究重点支援事业对象机构”资助项目的成果汇总。

借此机会再次感谢多年来国内外同行的鼎力支持!

作者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编 历史足迹	1
第一章 倭国使“司马曹达”的姓氏与出自	/ 3
第二章 遣唐使时期的中日混血儿	/ 14
第三章 日本战国大名大友义镇的遣明船	/ 26
第四章 一山一宁出使日本经过及其影响	/ 35
第五章 连结中日的世界语者长谷川照 ——国际主义女性勇敢的一生	/ 49
第二编 意象传播	57
第六章 唐宋诗人的“日本想象”	/ 59
第七章 中国史料描绘的遣唐使形象	/ 69
第八章 漂洋过海的李白形象 ——从中国到日本	/ 82
第九章 东传日本的中国禅僧绘画 ——以永井重良的顶相画为中心	/ 103

第十章 长崎中国佛像师与唐样十八罗汉雕像	
——以万福寺为例	/ 117
第十一章 江戸时代漂抵日本的清人图像	/ 134
第十二章 清代中国日本蒔绘的受容	/ 151
第三编 信息互动	159
第十三章 遣唐使与“唐消息”	/ 161
第十四章 山上忆良与“任征君”	/ 168
第十五章 东西交错中的冈仓天心	
——日本近代绘画史研究的方法与东亚	/ 175
第十六章 清朝帆船带来日本的鸦片战争情报	/ 185
第十七章 从胡秉枢著《棉砂糖大利之要论》看近代中日农业技术交流	/ 208
第十八章 王国维与日本京都学派的学术互动	/ 216
第十九章 《译书汇编》与清末留日学生	/ 232
第二十章 仓石武四郎的现代汉语教育观	
——从其汉语发音标记法的方针变化	/ 247
第四编 以文会友	271
第二十一章 宋濂与日僧交往二三事窥	/ 273
第二十二章 入明僧与径山寺	/ 286
第二十三章 中村敬宇与清末的官僚文人	/ 298
第二十四章 吴朗西和饭森正芳	
——近代中的知识分子交流一例	/ 321
第二十五章 近代日本文人与中国文化	
——大正文人的上海体验	/ 335
后 记	345

01

第一编

| 历史足迹 |

第一章 倭国使“司马曹达”的姓氏与出自

郑州大学 亚太研究中心 葛继勇

《宋书·倭国传》载,“太祖元嘉二年,讚又遣司马曹达奉表献方物”(亦见于《南史·倭国传》)。其中“太祖元嘉二年”为宋太祖刘裕在位的公元425年,“讚”指倭国王讚(也作“赞”),学界倾向其为第十六代天皇仁德。^①

关于倭国使者“司马曹达”,学界论争纷纭。最早对此关注的日本学者中,藤田元春等把“司马”视为姓氏,支持此说的中国学者认为“司马曹达”是见诸日本史籍最早的司马氏族人,与传播佛教的司马达等(一说达止)有一定的渊源关系。^②坂元义种等认为“司马”是官职,支持此说的中国学者进一步认为“司马曹达”是负责军事的使节”。^③不过,到目前为止,学界对曹达的出身却未有论及。那么,“司马”到底是“姓”,还是“官”呢?如果是“官”名,曹达来自哪里?为何倭国王要派遣大陆移民后裔来华朝贡?如下,笔者尝试对这一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进行考证,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魏晋南北朝的“司马”官

《汉书·百官公卿表》对“周官”的记载中有:

天官冢宰,地官司徒,春官宗伯,夏官司马,秋官司寇,冬官司空,是为六卿。……或说司马主天,司徒主人,司空主土,是为三公。

① [日]木宫泰彦著:《日华文化交流史》,载《富山房》,1965年。

② 韩升著:《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研究》,台湾文津出版社1995年版。

③ 王金林:《从大和国的“司马”、“典曹”、“舍人”、“史”、“藏”职看中国官职的影响》,载王金林著:《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。

可知,周时司马作为“夏官”,为三公或六卿之一,执掌邦政。历秦至汉初,未设“司马”之职,至武帝元狩四年,置“大司马”,以冠将军之号,总理军政。不久赐“大司马”金印紫绶,置官属,禄比丞相。其后,大将军、中尉、城门校尉属官皆有“司马”,卫尉之下有“公车司马”,边郡也置“千人司马”。魏承汉制,大将军下皆置有“司马”一职。

另据《晋书·职官部》载:

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为持节、都督,增参军为六人,长史、司马、从事中郎、主簿、记室、督祭酒、掾属、舍人如常,加兵公制。

可知,晋时,“诸公及开府位从公为持节、都督”者的署官皆置有长史、司马。南北朝之际,官府及军府的幕僚中,设有次于长史的“司马”一职。《宋书·百官志》载:

自太尉至大将军、骠骑、车骑、卫将军,皆有长史一人,将军又各置司马一人。……江左以来,诸公置长史、仓曹掾、户曹属、东西閤祭酒各一人,主簿、舍人二人,御属二人,令史无定员。领兵者,置司马一人,从事郎中二人,参军无定员。

又《通典》卷二十九、职官十一、武官下对将军开府设官属也载有:

晋骠骑、卫将军、伏波、抚军、都护、镇军中领、四征、四镇、龙骧、典军、上军、辅国等大将军开府者,皆为位从公,品秩俸赐亦与诸公同,加兵者增置司马一人、从事中郎二人、主簿、记室、督各一人,官属并与公同。宋大将军、骠骑、车骑、卫将军诸府皆有长史一人,又各置司马一人。齐有大将军为赠官,无僚属,诸骠骑、车骑、卫、镇军、中军、抚军、四征、四镇等将军,凡加大字,位从公,长史、司马诸官属亦同公。梁因之,诸将军优者亦然。陈为赠官,无僚属。后魏大将军僚属如三公。北齐亦然。后周大将军有长史、司马、中郎、掾属、诸曹、参军、典籤等员,隋以后无。

可知,将军开府者,皆置有长史、司马等官属,领兵者可增置司马一人。长史、司马掌有吏卒,可知,在南北朝时,司马有“大司马”和“司马”之分,大司马

为朝廷重臣；司马则为朝臣诸公、将军或王国、郡县等官府中负责具体事务的属官。另据《通典·职官》载：“（晋代）司马给吏卒，如长史。”司马给吏卒，属于中层官吏。

隋初，以州为郡，无复军府，则州府之职多为郡官，故有长史、司马、录事、参军、功户、兵、法等七曹。但司马一职时存时废。至唐，州府佐吏与隋制同，有别驾、长史、司马一人。都督、都护属下也置有长史、司马各一人。节度使属僚设有行军司马，后废而不置。《通典》卷三十三、职官十五、州郡下对司马一职的沿革详载如下：

司马，本主武之官。自魏晋以后，刺史多带将军，开府者则置府僚，司马为军府之官理军事。宋制司马铜印墨绶绛朝服武冠。至隋唐州府之任，无复司马，而有治中焉。治中，旧州职也。州废遂为郡官。开皇三年改治中为司马，炀帝又改司马及长史，并置赞治一人，寻又改赞治为郡丞。大唐武德初复为治中。贞观二十三年高宗即位，遂改诸州治中并为司马，所取与长史同。

据此可知，至唐，仍设置司马一职。

那么，在大和国的官职称谓中有无“司马”呢？查《倭名类聚钞》（源顺撰，成书于938年）卷五《职官部》，发现“史”、“军曹”、“司”、“舍人”官职名等历历在目，而“司马”之职却未见记载。不过，大和国的军事机构基本上是模仿中国官职而设置的。事实上，魏晋南北朝时，日本已经受中国官制的影响，但大多没有被后来的律令官制直接继承。而“司马”一职在唐时渐趋废置，至奈良时代，日本的官职名称用中国名的习惯尚不多见。^① 因此，编于十世纪的《倭名类聚钞》没有收入，并不说明日本古代不存在“司马”一职。

二、朝鲜半岛诸国的“司马”官

府官制起源于汉代，东晋后中央、地方的将军之下设有长史、司马、参军等

① [日]古濑奈津子：《关于日本官职称谓用唐代官名的考察》，载刘俊文、池田温主编：《中日文化交流史·法制卷》，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。事实上，邪马台国已被曹魏授予率善中郎将、率善校尉等官职（《三国志·魏志·倭人传》），但没有被传承下来。

官职,辅助甚至代行将军的政务。南北朝时,林邑、呵罗单、盘达等南方诸国的来华使节也都带有长史、司马等官职,西方的吐谷浑、高昌等国也设置了府官制。在东亚地区,周边国家模仿中国官职设置官府,自称“将军”并“假授”臣下“将军号”要求中国封建政府“除正”,或直接采用中国式的官号爵位,高句丽和百济两国极为突出。

先看高句丽。据安岳三号坟(冬寿墓)墓志铭(永和十三,即357年)载,冬寿曾担任“使持节、都督诸军事、平东将军、护抚夷校尉、乐浪相、昌黎·玄菟·带方太守、都乡侯”等官职。冬寿咸康二年(336)亡命高句丽的晋人或燕人,原为慕容皝的“司马”。可见,此时“司马”官已东传高句丽。

另据高句丽德兴里古坟的墓志铭(永乐十八,即408年)载,墓主曾任“建威将军、□(原缺)大小兄、左将军、龙骧将军、辽东太守、使持节、东夷校尉、幽州刺史”等官职。从古坟的特征来看,墓主与上述冬寿一样为移居高句丽的中国人。该古坟中的官吏行列图的铭文也写有“镇□(原缺)府长史、司马、参军、典军录事、□(原缺)曹金史、诸曹职史”和“镇□(原缺)刺史、司马”等官职。可见,墓主身为将军,曾设府官,置“司马”官。^①

另据《宋书·高句丽传》载,高句丽王义熙九年(413)遣长史高翼、景平二年(424)遣长史马娄、孝建二年(455)遣长史董滕赴南朝宋朝贡。这表明,高句丽摄取中国官制遍及中央和地方的军事和行政领域,且与高句丽固有的官位制并存。长史、司马、参军等府官历历在目,且多为朝贡使节的官职。据《梁书·高句丽传》载:“(慕容宝)以句丽王安为平州牧,封辽东、带方二国王。安始置长史、司马、参军官。”可知,永康元年(396)高句丽王安(好太王)被后燕慕容宝封为平州牧、辽东·带方两国国王后,“始置长史、司马、参军官”。

再看百济。据《宋书·百济国传》载,百济王景平二年(424)遣长史张威赴宋,元嘉二年(425)宋太祖刘裕诏赐“使持节、都督百济诸军事、镇东大将军、百济王”,大明二年(458)遣使要求除正行冠军将军右贤王余纪等十二人获准。据《魏书·百济国传》载:

延兴二年,其王余庆始遣使上表曰:(前略)谨遣私署冠军将军、骠马都尉、弗斯侯、长史余礼、龙骧将军、带方太守、司马张茂等投舫波阻,搜径玄津,托命自然之运,遣进万一之诚。

^① 参见[日]铃木靖民:《倭の五王》,载佐伯有清编:《古代を考える雄略天皇とその時代》,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。

可知,延兴二年(472),百济王遣私署冠军将军、驸马都尉、弗斯侯、长史余礼和龙骧将军、带方太守、司马张茂赴魏通交。《南齐书·百济国传》载,百济王永明八年(490)遣使上表,要求除正属下官爵。由此可知,百济也存在标志使节地位的,由长史、司马、参军等组成的府官制。这些官职应是在义熙十二年(416)百济王余映从东晋获得使持节、都督百济诸军事、镇东将军、百济王之后设立的。可见,朝鲜半岛的高句丽和百济都模仿中国的府官制度。

百济与倭国交流频繁,对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起着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。因此,百济等国存在的将军府和府官,一定会对倭国产生有重要影响,推动日本建立设有司马的将军官府。从东晋南朝赐予高句丽、百济及倭王的封爵来看,倭国王讚根据册封体制,模仿百济设置府官制,建立都督、将军府、置有“司马”、“平西”、“征虏”、“冠军”、“辅国将军”等官号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
三、倭国官制与“司马”官

据《晋书·职官志》知,开府仪同三司为汉官,魏晋时,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,设置长史、东西阁祭酒、东西曹掾等职;加兵者,增置“司马(给吏卒如长史)”、“从事中郎”等官职;持节都督者,增置“长史”、“司马”、“给事中郎”等职“如常加兵公者”。不过,倭五王(讚、珍、济、兴、武等五位国王)始终没有从南朝得到可以开府的“开府仪同三司”官爵,倭王讚遣使朝贡时更不可能有“司马”官。是否以此断定:南朝没有承认倭五王“开府仪同三司”,大和国就没有开设军府、没有“司马”一职呢?笔者认为,不能如此武断地下结论。

严耕望曾指出:“凡统军,不论‘都督’、‘监’、‘督’,皆加将军,开府置佐……“汉末三国时代,以地方不宁,此时郡守有加将军领兵,或置长史、司马。东晋以降,军府始渐形成。……其军事重地或边控蛮夷者,且亦置军府,……惟或不置长史。”^①当时规定,能开府的将军官品在三品以上,这类将军以征、镇、安、平四类为多。^②由此可知,车骑及征、镇、安、平四类将军与刺史、都督、仪同三司者如领兵,则均可开府,设置“司马”一职。早在386年百济王余晖就被封为“镇东将军”,457年余庆被封为“镇东大将军”;413年、416年高句丽王高瑛

① 严耕望:《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》,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90年版。

② 陈奕玲:《考议魏晋南北朝的将军开府问题》,载《西安教育学院学报》,1999年第2期。

被封为“征东将军”，463年高句丽王被封为“车骑大将军”，480年又被封为“骠骑大将军”。因此，两国存在由长史、司马、参军等组成的府官制不足为奇。

从倭国王每次自称持使节、都督诸国军事等以及要求“除正”下属官吏的职位，可以得知倭王遣使奉献之前，已对这些官职“胸有成竹”。事实上，在413年倭国王讚已遣使奉献，倭国王讚很可能此时熟知中国的官制，仿造设置府官制，并任命曹达为司马奉献南朝。因此，倭王武要求的“开府仪同三司”虽未被承认，但在与宋的外交中，一定设置了称为“府官”的机构。^①

在遣使赴刘宋朝贡时，倭王不仅为自己索求将军号、国王号，而且还为臣下索求军、郡号。如《宋书·倭国传》载：

赞死，弟珍立，遣使贡献。自称使持节、都督倭、百济、新罗、任那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、安东大将军、倭国王，表求除正。诏除安东将军、倭国王珍。又求除正倭隋等十三人平西、征虏、冠军、辅国将军号，诏并听。……二十八年，加使持节、都督倭、新罗、任那、加罗、秦韩、慕韩六国诸军事，安东将军如故。并除所上二十三人军郡。

据此可知，倭国王珍曾多次获得可以开府的“安东将军”爵号，下属倭隋等十三人获得平西、征虏、冠军、辅国等将军号。对此记载，铃木靖民指出：“纵观刘宋时代的中日通交，可以发现，倭王通过遣使朝贡获取将军号、国王号，来行使对臣下将军号、太守号的假授并上奏刘宋王朝予以除正，借此独占对外的通交征伐权和对内的军事支配权。这种对内行政权的委托与对外军事权的独占是相辅相成的。”^②大和国设置“司马”、“典曹”、“舍人”、“史”、“藏”职，应该是受中国官职的影响。^③

如下，我们再看看历代正史倭国传（日本传）中对倭使官职的记载（着重号乃笔者所加）：

景初二年六月，倭女王遣大夫难升米等诣郡，求诣天子朝献。……其

① [日]吉村武彦：《日本古代国家的形成与中国、朝鲜》，载王金林、汤重男主编：《走向国际化的日本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。

② [日]铃木靖民：《倭の五王》，收入佐伯有清编《古代を考える雄略天皇とその時代》，吉川弘文馆1995年版。

③ 王金林：《从大和国的“司马”、“典曹”、“舍人”、“史”、“藏”职看中国官职的影响》，收入王金林著《汉唐文化与古代日本文化》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。

四年,倭王复遣使大夫伊声耆、掖邪狗等八人上献(下略)。(《魏志·倭人传》)

倭王遣小德阿鞞台,从数十人,设仪仗,鸣鼓角来迎(裴世清)。后十日,又遣大礼哥多毗,从二百余骑郊老。(《隋书·倭国传》)

长安三年,其大臣朝臣真人来贡方物。朝臣真人者,犹中国户部尚书,冠进德冠。……元和元年,日本国使判官高阶真人上言(下略)。(《旧唐书·日本传》)

长安元年,其王文武立,改元曰大宝,遣朝臣真人栗田贡方物。朝臣真人者,犹中国户部尚书,冠进德冠。……建中元年,使者真人兴能献方物。(《新唐书·日本传》)

此外,《宋书》对外来使节的官职也有记载,除上述文中已引用的部分之外还有:

高句丽王高璉,晋安帝义熙九年,遣长史高翼奉表献赭白鸟。(《宋书·高句丽传》)

少帝景平二年,(百济王余)映遣长史张威诣阙贡献。(《宋书·百济传》)

由上述记载可知,魏晋南北朝,谈到使者姓名时常加上其官职;《宋书》在同卷蛮夷传中谈到使者姓名时也都加上其官职,且这些官职均为负责军事的属官。结合当时朝鲜半岛的军事形式分析,高句丽和百济派遣与军事有关的“长史”作为使节,的确具有很深的军事性目的。因此倭王也会仿造上述两国,派负责军事的属官“司马”赴南朝,谋求军事利益。参见表1。

表1 南北朝时代东亚诸国使节一览表

派遣国	派遣地(国家)	时间	身份	姓名
高句丽	东晋	义熙九年(413)	长史	高翼
高句丽	宋	景平二年(424)	长史	马娄
百济	宋	景平二年(424)	长史	张威
倭国	宋	元嘉二年(425)	司马	曹达
高句丽	宋	孝建二年(455)	长史	董腾
百济	北魏	延兴二年(472)	驸马、长史	余礼